

●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 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行动的抉择和分歧

李 积 顺

(西 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作者简介] 李积顺(1954-), 男,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摘 要] 诺曼底战役前夕, 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就战略空军在“霸王”行动中的任务和作用展开争论, 制定并完善了“轰炸战略”决策。关于“铁砧”行动的取舍所进行的争论深受英美两国战略分歧的影响, 使最高统帅部未能作出最佳决策。艾森豪威尔对诺曼底战役后的进攻战略虽有规划, 但未能进行讨论, 从而埋下了未来争论的种子。

[关键词] 盟军最高统帅部; “霸王”行动; “铁砧”行动; “宽大正面”战略

[中图分类号] K71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38-07

从 1944 年初开始, 英美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曼底战役(代号“霸王”行动)随着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统帅而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 盟军最高统帅部和英美两国之间就地、空协同的空军“轰炸战略”问题、地面配合的“铁砧”行动取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诺曼底战役后盟军向德国全面挺进的战略路线问题虽然没有展开充分的争论, 但却潜藏着激烈争论的因子。本文试图对这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考察和探讨。

—

诺曼底战役的空军作战计划由两部分组成。英美战术空军在英国利·马洛里将军的领导下, 直接由艾森豪威尔指挥, 参加“霸王”行动, 这是不成问题的。由卡尔·斯帕茨空军中将率领的美国战略空军和由阿瑟·哈里斯空军上将率领的英国战略空军, 原本属于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指挥, 在 1943 年对德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联合轰炸攻势”, 逐渐取得了对德空中优势, “当 1943 年临近结束之际, 进攻计划的新阶段明显将要到来了”<sup>[1]</sup> (P. 36)。

艾森豪威尔出任最高统帅后, 要求拥有战略空军的指挥权, 对所有三支空军的作战行动担负责任<sup>[2]</sup> (P. 1784, 1785)。但哈里斯和斯帕茨却反对把战略空军用在战术行动上, 丘吉尔或明或暗予以支持。在艾森豪威尔的坚持和马歇尔的干预下, 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决定在“霸王”行动的关键期, 授予艾森豪威尔对战略空军的“指导权”。无论是“指挥”还是“指导”, 艾森豪威尔都要盟国的战略空军将作战重心转向地、空协同作战, 保证渡峡进攻的胜利。但是, 对于战略空军要不要实现这个转变, 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 在盟军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并导致为“轰炸战略”之争。

铁路是现代军队大规模机动性的命脉。盟军最高副统帅特德和战术空军司令利·马洛里主张轰炸“铁路目标”。利·马洛里认为, 盟国空军应在诺曼底登陆前 90 天把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铁路系统彻底摧毁, 以阻止敌人向西线运输部队<sup>[3]</sup> (P. 50)。特德表示, 有计划地轰炸西欧的铁路中心、调车场, 延阻德

军的增援和军需品的供应,是保证诺曼底登陆战胜利的最合适方法<sup>[1]</sup>(P.4)。上述主张得到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等陆军将领的支持。

英国战略空军司令阿瑟·哈里斯主张轰炸“城市目标”。他信奉“空军制胜论”,认为可以通过把德国首都夷为平地的方式来赢得战争。他说:“如果美国陆军航空队能与我们联合作战的话,我们可以把柏林彻底破坏掉。这样做虽然会损失400到500架飞机,但可以使德国人输掉这场战争。”<sup>[4]</sup>(第76页)丘吉尔也认为轰炸德国城市是一条代价小、收效大的捷径。

石油是战争机器的血液。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主张轰炸“石油目标”。虽然斯帕茨在轰炸目标上跟哈里斯见解不同,但在坚持“空军制胜论”方面却是相似的。出于职责本位和个人性格,他疑虑渡峡登陆战的代价巨大和前景难测,更倾向于以强大的盟国空军取胜。斯帕茨起初说,使用战略空军就可征服德国,“横渡海峡登陆西欧是不必要之举”<sup>[5]</sup>(P.477)。后来,他看到战略空军必须在诺曼底战役中担负重任,于是又表示在进攻日开始前两周担负“霸王”行动准备阶段的轰炸任务就可以了,当务之急是瞅准德国的要害,轰炸石油目标。

1944年前3个月,盟国战略空军在这种“边炸边争”中对敌作战。1944年3月25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讨论决定未来几个月的“轰炸战略”,会上特德首先阐述了“铁路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要轰炸铁路中心和调车场。艾森豪威尔随后表示:在“霸王”开始的5至6周,是盟军最关键的时期,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证登陆成功,空军对此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是阻止敌人调动,目前应当采纳铁路目标<sup>[1]</sup>(P.89-91)。在两位主帅的主旨发言之后,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言,有分析、有赞成、有保留,侧重不同。其中哈里斯和斯帕茨对“铁路计划”力持非议。哈里斯力陈“铁路计划”的不当和“城市目标”的优点。斯帕茨建议继续消灭德国空军和支持空军的工业;其次是轰炸轴心国的石油生产;最后再制定计划对“霸王”行动进行直接的战术支援,轰炸交通设施和其它各种军事设施<sup>[1]</sup>(P.93,94)。

参加会议的有关专家和研究人员表示,德国已经在西线储存了3至6个月的石油,轰炸石油目标短期内对德军战斗力不会产生影响。会议最后决定了“轰炸战略”。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1)“战略空军在关键时期也应负有明确的战术任务”<sup>[6]</sup>(P.9),“在登陆作战的关键性初期作及时支援,直到我们牢牢地站稳了脚和失败的危险消除后”<sup>[7]</sup>(第248页)。(2)具体任务是轰炸“铁路目标”,主要是大型铁路中心、编组调车场,以此“瘫痪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系统,以限制敌人的机动性”,使法国北部成为“无铁路区”<sup>[6]</sup>(P.10)。(3)“一旦霸王行动渡过第一个关键时刻,就应考虑石油目标。”<sup>[1]</sup>(P.95)

虽然3月25日会议将“城市目标”基本排除在外,只在铁路目标和石油目标之间选择了前者,从而初步解决了战略空军在“什么时间”轰炸“什么目标”的问题,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轰炸战略”还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过程之中。

首先,铁路目标和石油目标并非有此无彼,而能相互补充。铁路目标、石油目标和城市目标有时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很难截然分开。石油目标周围或附近就往往有铁路运输中心,而大型铁路中心往往是一个大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帕茨和哈里斯坚信自己意见正确,对轰炸铁路目标态度消极,有时就以轰炸铁路目标之名行轰炸石油目标或城市目标之实。一旦轰炸效果尚佳,即得到认可。

其次,最高统帅部也根据轰炸效果,审时度势,完善决策。艾森豪威尔通过后来的命令和“口头允诺”,让下级将领灵活作战。斯帕茨于3月31日向艾森豪威尔呈递备忘录,继续陈述选择石油目标的理由。接着以继续轰炸石油目标的评估结果来证实自己意见的正确。丘吉尔一直赞同轰炸城市目标,也认可石油目标,最不愿接受铁路目标。艾森豪威尔花了3周时间才勉强说服了丘吉尔。于4月17日才向斯帕茨和哈里斯发布正式命令,称:“在霸王进攻之前,战略空军的特殊任务是:a.消耗德国空军,特别是德国的战斗机队,摧毁和瓦解支援它们的设施。b.摧毁和瓦解敌人的铁路系统,特别是那些影响霸王滩头阵地运输的交通”<sup>[1]</sup>(P.6)。其微妙变化显而易见,即为了制空权,向斯帕茨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4月19日,在斯帕茨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口头允许同意”随后两天在天气良好时轰炸德国的石油目标。以此为先例,对石油目标的轰炸实际上在断断续续进行。

再次,“铁路计划”在不断完善。3月25日的决定所指的是铁路中心和编组调车场,根据地中海战场的经验,轰炸桥梁代价太大,旷野铁路线容易修复,故把二者没有考虑在内。在随后的轰炸实践中,“德国人以令人钦佩的效率在修复被轰炸的编组车场和铁道”<sup>[1]</sup>(P.60)。英国空军在4月21日对法国和比利时的几座桥梁实施了试验性轰炸,效果比预计的理想。于是,敦促轰炸桥梁的要求强烈起来。5月7日,第九航空队的4次轰炸使法国、比利时的若干桥梁、铁轨受到严重破坏。5月10日,利·马洛里下令摧毁阿尔伯特运河和默兹河上的桥梁。最高统帅部不久就为空军制定了一个范围广泛的“截断计划”,要求在塞纳河到芒特,从卢瓦尔到布卢瓦,以及巴黎—奥尔良峡谷的关键地点,炸毁所有的桥梁。

总之,在诺曼底战役前夕,最高统帅部在争论——实行——完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铁路目标”为重点,兼及“石油目标”的“轰炸战略”。对此,罗斯托在《进攻前的轰炸战略》一书中责难颇多,认为选择铁路目标而推迟石油目标是一大错误,在铁路目标中重视铁路中心、编组调度场而忽视桥梁是又一错误。布雷德利则说,盟国战略空军的轰炸使法国北部交通系统瘫痪,“对霸王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这无异于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最大功绩之一”<sup>[8]</sup>(第283页)。不管怎样,从1944年4月开始,盟国战略空军对西欧地区的大型铁路中心和桥梁枢纽进行猛烈轰炸,实现了使法国北部成为“无铁路区”的目标,使德军无法迅速派后备部队到告急地区增援实施反击,从而为诺曼底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应看到,“空中计划准备的各种因素,运输计划、石油计划、临近进攻日的轰炸桥梁等,共同构成了歼灭诺曼底德军的图景”<sup>[9]</sup>(P.70)。

## 二

如果说,“轰炸战略”之争或许与丘吉尔的“政治明智性”多少有些瓜葛之外,就其他争论者而言,主要是个人的军事素养和职责本位所使然。换言之,它基本上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与“霸王”行动进行地面配合的“铁砧”行动(Anvil Operation)所引起的争论,则受到了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争论双方的代表是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为了保证诺曼底主攻战役的胜利,盟军还需要同时进行一个辅攻战役。对此,英美两国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决定,为配合法国北部的“霸王”行动,在法国南部组织一次代号为“铁砧”行动的登陆战役。同年12月初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要求继续盟军在巴尔干的攻势,但由于罗斯福的坚持和斯大林的支持,最后还是确定为配合“霸王”行动,实施“铁砧”行动不变。作为对丘吉尔的让步,允许盟军在意大利继续作战。

德黑兰会议后,艾森豪威尔着手制订和审定“霸王”与“铁砧”行动的实施方案。但从1943年底开始,英国在意大利先声夺人发起攻势,战事不断扩大,德军抵抗顽强,战斗激烈。英国提出,取消“铁砧”,把用于“铁砧”的部队用在意大利,并称这样也可以对“霸王”行动起到战略配合作用。这样一来,配合“霸王”的辅攻应该坚持“铁砧”,还是转移到意大利战场,争议很大。丘吉尔首相和布鲁克参谋长坚决反对“铁砧”计划,美国的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坚持“铁砧”行动不能取消。这一表面上看似军事行动的争论,由于英美两国关于欧洲战略分歧的影响而变得十分棘手。

1944年上半年的英美欧洲战略分歧是1942、1943年两国战略分歧的继续和发展。概而言之,英国继续主张边缘迂回路线,加紧在意大利的进攻,从南线打进德国,同时直插东欧,堵截苏军西进。美国继续主张正面突破路线,横跨英吉利海峡,从西向东,经法国打进德国,同西进的苏军互相配合,打败纳粹德国。这种战略分歧直接影响到“铁砧”行动的取舍。

艾森豪威尔主要以军事方面的理由坚持“铁砧”行动必须实施:第一,“法国南部的辅助进攻是渡峡主力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7]</sup>(第269页),可以从诺曼底引开德军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两处登陆部队可以遥相呼应,相互支援。第二,在法国南部开辟战场,可以使更多的英美盟军部队登上欧洲大陆,还可以为法国部队参战开辟战场。第三,及早开辟法国南部港口,可以使美国向欧洲大陆运送补给物资缩短

路程。第四，艾森豪威尔还把“铁砧”行动同以后的“宽大正面”战略加以总体考虑。他说：“我们的部队应在瑞士边境和北海之间这个广大范围内进行最大限度的集结，因为在那里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国心脏突进”<sup>[7]</sup>（第315页）。“盟军的稳妥战略是迫使德国人在最宽大的正面战场上战斗。”<sup>[10]</sup>（P. 225）具体说，就是在北面占领安特卫普，南面占领马赛，然后从北到南全线摆开向前推进，席卷法国，攻入德国。

英国方面取消“铁砧”的理由是：意大利战役吸引了大批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使之不能用于对付“霸王”行动，这已经达到了“铁砧”行动要达到的主要军事目的；如果把分配给“铁砧”的地面部队投入到意大利战场，增援地面攻击部队或加强两栖作战的突击力量，则对“霸王”行动的支援配合作用会更加突出；如果把原定在“铁砧”行动中使用的部分坦克登陆艇改用于“霸王”行动，则会加强“霸王”行动的突击力量。

军事层面的理由仁智互见，但政治层面的考虑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英国是老牌殖民大国，地中海是连接英国本土和广大殖民地的纽带。巴尔干和南欧地区既是地中海的安全阀和桥头堡，还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返回欧陆的一条重要通道。为此，在前两年的两国战略争论中，英国曾不遗余力地坚持打击轴心国“柔软的下腹部”，如今又新瓶装旧酒，提出“刺伤亚德里亚海腋窝”的新设想：在意大利继续进攻，攻取的里亚斯特和伊斯特里亚半岛，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入匈牙利平原，直取维也纳，从南线进入德国<sup>[10]</sup>（P. 220）。英国的意图是要捷足先登，阻止苏联的势力向南欧扩展，不让苏联进入维也纳。在英国人的战时地缘战略中，欧陆这条“鳄鱼”，法国北部是坚硬的“头”，巴尔干是柔软的“下腹”，意大利是介于两者中间的“腋窝”，德国首都柏林是“心脏”。当丘吉尔的心态处“在斯大林的幻影下”<sup>[12]</sup>（P. 171）考虑问题时，就觉得攻击“下腹”直捣心脏是上策，攻击坚硬而距心脏较远的“头部”是下策，攻击“腋窝”也可直插心脏，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中策。1944年8月4日，当盟军在法国战场捷报频传时，丘吉尔却惊呼：“天哪！你看不见俄国人正像洪水般席卷欧洲吗？他们已经侵入波兰，现在无法阻止他们向土耳其、希腊进军了。”<sup>[11]</sup>（P. 173）此时，当上策早已逝去，中策实在难求，下策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时，丘吉尔的失望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苏首脑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互信关系，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得到了加强，罗斯福对自己软化苏联的手法充满信心。应该说，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之间的1944年，是战时美苏关系的黄金时期。“铁砧”行动取舍的争论中，美国势必要顾及同苏联的合作关系，不愿因此损害双方达成的政治军事谅解。

艾森豪威尔曾或多或少卷入了前两年英美两国的欧洲战略争论，又被一些人称为“政治将军”，自然深知“铁砧”行动之争的奥秘。但他这次以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姿态，完全以军事理由进行论争。他对丘吉尔说，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完全是从军事上的利弊得失考虑应该实施“铁砧”计划，如果首相从政治方面考虑应该取消，那就应该去同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参谋长谈。但马歇尔的回应是，艾森豪威尔作为“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应同英国人商量，独自解决这个问题。罗斯福深知履行义务是任何政治同盟生命力的基础。面对英国人对“铁砧”行动的种种异议和“腋窝”行动的诸多理由，他坚持要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方可。2月21日，“总统让李海提醒最高统帅，美国对第三国（俄国）承担有义务，他觉得不同第三国商量此事，西方盟国没有任何权力放弃对铁砧的诺言”<sup>[10]</sup>（P. 114）。

由于“铁砧”行动之争涉及到英美两国战略上的分歧和政治意图的差异，这就加大了艾森豪威尔作出决断的难度。一方面，他要维护英美联盟，保证英美盟军的团结和统一，因为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为此，他对英国的要求不能不作出让步。另一方面，他必须为“霸王”行动的胜利全力以赴，“铁砧”行动的取消显然对“霸王”行动不利。在反复权衡折衷后，他决定：“铁砧”行动必须实施，但规模缩小，时间推迟；盟军在意大利的攻势可继续，但放弃两栖作战，把那儿的登陆器材都转交给“霸王”和“铁砧”；同时，“霸王”行动的开始日期相应地从5月1日推迟到6月初。

推迟“铁砧”，对“霸王”行动是不利的。当诺曼底战役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法国南部海岸却风平浪静，意大利战场也是战绩平平。“铁砧”（7月初改为“龙骑兵”）行动是8月15日发动的，其时诺曼底战

役已准备打扫战场了。实际上,法国南部的辅助战役对法国北部的主攻战未起到应有的配合作用,所以不是理想的最佳决策。但是,坚持实施“铁砧”行动,对第二战场的战事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实施“龙骑兵”行动后40天内,从法国南部参加法国战役的盟军达38万人。随后更直接有力地加快了运送大批美军到欧洲大陆的步伐。诺曼底战役后,参加“霸王”和“龙骑兵”行动的两大盟军主力在法国会师,形成了全面摆开由西向东进攻的态势。按照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战略,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部队组成第6集团军群,成为宽大正面战略的南翼,同北路和中路大军一起,向德国突击。另外,法国南部港口的开辟为盟军运送了大批紧缺急需物资,到10月份,美国运送到欧洲的物资总数为130多万吨,其中经由法国南部港口运送的为52万多吨<sup>[9]</sup>(P.237)。9、10月间,法国北部的盟军因物资缺乏而影响作战,如果没有法国南部港口,其影响势必更为严重。总的看来,“铁砧”行动的坚持实施,对法国战场盟军的增援、后勤供给乃至后续战役的进展起了重要作用,是第二战场盟军大反攻总战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三

1944年5月,“霸王”作战计划日臻完善,随之而来的一个新问题是,将来在诺曼底战役结束之后,盟军采取什么战略路线向德国挺进,夺取胜利结束战争?这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按照几年来英美联合作战的经历来看,很有可能引发一次新的分歧和争论。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在诺曼底战役前夕盟军最高统帅部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和争论。除了史密斯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对艾森豪威尔的战略规划略有记述之外,其他高级将领对此几乎均未提及,就是研究欧洲战场颇具权威的福雷斯特·波格和著名的战史专家拉塞尔·韦格利,在其专著中也无论述。没有引起争论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英美两国将领之间不仅存在分歧,而且爆发了空前激烈、持续长久、颇伤感情的战略争论。这场争论,沸沸扬扬,从塞纳河一直争论到莱茵河,甚至延续到易北河。

按照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指令,西线盟军的任务是“攻入欧洲大陆,并与其他盟国合作,采取以攻入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sup>[9]</sup>(附录P.4)。据此,“攻入德国心脏”和“摧毁敌人武装力量”就成了盟军未来战略的指导原则。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在确定何处为“德国心脏”的问题上,英美将领的观点就有不同,继而导致了盟军进攻战略路线的严重分歧。

英国方面认为,纳粹首都柏林不言而喻是德国的核心,是盟军打击的首要目标。一旦柏林被盟军占领,就会使德国残余的武装力量失去信心而瓦解投降,从而尽早结束战争。因此,英国主张盟军派一得力将领,率领精锐部队,一路突击,似尖刀穿插,经北线直捣柏林。这种主张到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一路突击”战略。它的积极倡导者是蒙哥马利元帅,得到了丘吉尔首相和布鲁克参谋总长的大力支持。蒙哥马利深信,如果授权他将自己的计划付之实施的话,那么德国在1944年就投降了。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长史密斯认为,“德国有两个心脏。柏林作为纳粹堡垒首都,是政治心脏和最终目标。但对德国更为重要的是鲁尔,它是工业心脏。那里的城市、工厂生产着钢铁、枪炮和燃料,关系着德国战争贩子的生死存亡。我们能够肯定,他们会集中大量军队守卫它”<sup>[12]</sup>(P.154)。他们设想,盟军将集结重兵与敌决战,消灭德军主力,然后再进军柏林。艾森豪威尔主张盟军向东挺进的军事目标依次是:在北线占领安特卫普港、阿纳姆桥头堡、跨越莱茵河,从北面围攻鲁尔;中路进攻部队占领法兰克福走廊、萨尔工业区,再掉头北上,从南面围攻鲁尔。这就是后来“宽大正面”战略的雏形。它以全线推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特征,得到了美国军政当局的坚定支持。

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利认为,德军必将在“西壁”死守,盟军在德国边界上会有一场硬仗要打。他主张盟军应沿阿登山脉南北麓分两路东进,抵达德国边界,补充给养,然后发起最后的总攻<sup>[8]</sup>(第391页)。这个“两路突击战略”的主攻路线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南路,它同巴顿的要求相吻合。布雷德利要求最高统帅让他挥兵先行,穿过法国中部,直插法兰克福走廊。他认为,这是进攻德国的最短路线,而且地形开阔,便于机动作战,对盟军最为有利。

意见分歧是潜藏存在的。那么,是当初最高统帅部觉得不需要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吗?应该说,在诺曼底战役之前,为日后在欧洲大陆的全面反攻制定具体的计划似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要使计划符合实战,需要审时度势,相机决策。但是,对于西方盟国准备了几年、事关大战进程和结局的第二战场,如果在最后准备阶段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构思和规划,也是与情不符与理不通的。据史密斯回忆,经过同高级参谋人员的谋划,“艾森豪威尔手拿铅笔描绘出我们逼近和包围鲁尔的战略。在参谋地图上,他画出了两条主要的进军线”<sup>[12]</sup>(P.157)。具体规划是:

首先,估计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并以优势兵力发起强大攻势后,德军将撤退到塞纳河一线进行全面防御,凭借天险抵抗。盟军将推进到塞纳河岸与德军隔河对峙,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和给养。一切准备就绪后,盟军就渡河作战,展开全面攻势,向德国挺进。

其次,盟军跨过塞纳河后,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鲁尔工业区。鲁尔区是德国主要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基地。5月份设想,一旦希特勒察觉到盟军的战略意图,必将投入全部地面部队保卫鲁尔。那时盟军将同敌人主力展开决战,占领其军工生产基地,进而结束战争。

再次,为了实现夺取鲁尔这一主要目标,盟军将分兵两路,互相配合,齐头并进,形成分进合围之势。当时的设想是,盟军渡过塞纳河后,要以宽正面前进。进攻的重点放在左翼(北线),首先打通海峡沿岸各港口和安特卫普港,扫清德国在低地国家的V型导弹发射基地,并出击莱茵河下游,夺取阿纳姆桥头堡,直接威胁鲁尔;同时,右翼也挥戈东进,威胁萨尔盆地,并与南面“铁砧”作战的兵力相呼应,使整个战线连成一片,先推进到莱茵河一线,然后渡河包围鲁尔,再向德国腹地作最后的攻击。

诺曼底战役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基本上按上述规划,推行“宽大正面”进军战略路线。史密斯参谋长回忆说,“盟军最高统帅在军队上船之前制定的霸王行动大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sup>[13]</sup>(P.211)。作为规划这一战略图景的参与者之一,自然是赞誉有加:“它是导致在西欧取得对德军重大胜利的六大决策之一。”<sup>[12]</sup>(P.158,159)相对于蒙哥马利的贬斥真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由于“霸王”行动关系重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都被其所吸引,对将来欧洲大陆的进攻战略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等高级将领都全身心投入到当务之急的“霸王”计划中,致力于近期的具体计划和部署,为各自的战斗任务作准备。对未来的长远进攻战略还无暇顾及。只要最高统帅不征求意见,非职责范围之事,他们就不会劳神分心,更不会主动提及。艾森豪威尔同史密斯参谋长及部分参谋人员谋划的仅是未来欧洲第二战场的“大战略”,是一个总规划,还不是具体的作战计划。他们可能以为,此事将来还有机会从长计议。这种对将来进攻战略的轻视,为未来的战略争论留下了伏笔。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霸王”行动最后准备阶段的分歧和抉择,对于诺曼底战役的成败和第二战场开辟后的战局发展至关重要。“轰炸战略”之争是关于战略空军如何配合两栖登陆部队的军事争论,由于盟军高级将领们的职责不同和军事素养的差异,他们对于战略空军是否担负战术任务,以及如何担负战术任务,存在意见分歧并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使得最高统帅部的决策日益完善和更加合理。关于“铁砧”行动的争论,既是如何进行地面配合的军事争论,更是英美两国欧洲战略和对外政策分歧的继续和发展。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艾森豪威尔不能以“霸王”行动的军事需要为最高准则作出最佳抉择。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长远战略构思,实属必要,但未能及早在有关将领之间进行适当的讨论和沟通,因而为未来更加激烈的战略争论埋下了种子。在一个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由于国家利益、民族情感、个人性格、军事素养等差异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和争论是毫不奇怪的。如何做到既能照顾各方利益,保持盟军的团结统一,又能让众将官各尽其才,畅所欲言,辨析推演,在争论中作出最佳决策,需要出众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这可能是我们研究第二战场和英美联盟作战的重要意义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 1 ] ROSTOW, W ° W. Pre-Invasion Bombing Strategy, General Eisenhower's Decision of March 25, 1944[ M ] . Austin, 1981.
- [ 2 ] CHANDLER, Alfred D. 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The War Years III[ M ] .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0.
- [ 3 ] T EFFER, Authur. With Prejudice The War Memoirs of Marshal of the Royal Air Force Lord Tedder[ M ] . London, 1966.
- [ 4 ] [英] 戴维 ° 欧文. 盟军高级司令部内幕[ M ] . 张德广,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 [ 5 ] BUTCHER, Harry C. My Three Years with Eisenhower[ M ] . New York, 1946.
- [ 6 ] DWIGHT, D. Eisenhower. Eisenhower's Own Story of the War[ M ] . New York, 1946.
- [ 7 ] [美] 德怀特 ° 艾森豪威尔. 远征陆欧[ M ] . 樊迪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75.
- [ 8 ] [美] 克莱尔 ° 布莱尔. 将军百战归: 布雷德利自传[ M ] . 廉怡之译. 北京: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5.
- [ 9 ] WEIGLEY, Rusell F. Eisenhower's Lieutenants the Campaign of France and German 1944 - 1945 [ M ] . Bloomington, 1981.
- [ 10 ] POGUE, Forrest C.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 The Supreme Command[ M ] . Washington D. C., 1954.
- [ 11 ] MORAN, Lord. Churchill: Taken from the Diaries of Lord Mora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 - 1965 [ M ] . Boston, 1966.
- [ 12 ] SMITH, Walter Bedell. Eisenhower's Six Great Decisions - Europe 1944 - 1945 [ M ] .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1956.

(责任编辑 桂 莉)

## The Supreme Command in the Last Preparatory Stage of "Overlord" Operation: Divergence & Choice

LI Ji-shun

(College of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Biography:** LI Ji-shun (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and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bstract:** The pre-D-Day, "Bombing Strategy" decision was made and perfected in the Supreme Command by way of argument about task and affect of the strategic air force in "Overlord". The supreme commander could not make the best choice about "Anvil" for fall into an argument with Churchill. About future strategy after Normandy campaign, Eisenhower worked out the conception of "Broad Front" strategy, but not discussed in the supreme command. Factor of argument was left over.

**Key words:** the Supreme Command; "Overlord" operation; "Anvil" operation; 'Broad Front' strategy